



近代汉日词汇 交流研究

李运博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近代汉日词汇 交流研究

李运博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汉日词汇交流研究 / 李运博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1 (2018.11 重印)

ISBN 978-7-5135-9814-9

I. ①近… II. ①李… III. ①词汇—文化交流—研究—中国、日本—近代
IV. ①H363②H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3276 号

出 版 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戚 新
封面设计 彩奇风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30.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814-9
定 价 79.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98140001

作者介绍

李运博，男，1969年生，获得日本教育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兼任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韩语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翻译协会中日翻译研究会副主任，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全国优秀教师，在日语语言学、中日词汇与文化交流史研究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

近年来，共出版专著、译著等10部，国家级教材2部，共计500余万字。发表论文近50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项，天津市教改项目2项；作为子项目负责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出版总署重点项目各1项，省部级项目3项。

本书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中日词汇交流史”的结项成果

(项目批准号: 08BYY076, 结项证书编号: 20141394)

前言

众所周知，在中日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交流过程中，始终是以文化的交流为主线的。特别是，两国间围绕着汉字词汇的交流，以及近、现代词汇的互通互融既简单又复杂，形成了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大致来说，以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为分界线，明治维新前，中国始终处于文化输出者地位；而明治维新之后中国逐渐让出了主体地位，日本就势完成了角色的转换。这就造成了一方面大量的汉语被传播到了日本，另一方面现代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日语借词，这一客观现象已广为人知。这种情况是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形成的？日语借词的数量有多少？其融入到汉语词汇中的过程是怎样的？发生了哪些文化现象？对中日两国的社会发展以及两国关系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另外，在针对日本的研究中，大多集中在社会、经济、历史、语言、文学等领域，尽管在文化交流，特别是在词汇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遗憾的是，有关研究普遍存在着重视个体性研究，忽视整体性研究的倾向，即人们都习惯倾向于针对某个或有限的几个词进行“语志学”研究，却忽视了对汉日词汇交流的整体性把握。具体来说，存在着日本学者过于拘泥于日语借词的研究，中国学者也常常只是局限在单向的词汇演变与传播上，而未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不同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互通互融，相互影响的实际状况进行具体的考察。特别是，目前以对汉语或日语语言本身认识和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较多，而就词汇的交流对本国、对象国的文化及社会的认知所给予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看，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较高的启发意义。

本书着重以近代汉字词汇的交流为对象,从宏观的角度对在中日两国词汇交流过程中发生的文化现象,及其对中日两国社会发展及国家关系形成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整体性考察。整体上看,本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

第一、对近代中国人对日本语言文字的认知(日语观)进行了全景式考察。

中日两国在词汇方面的交流,尤其是日语借词得以融入到汉语词汇中这一事实是以近代中国人对日语词汇的认同和借鉴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具有积极意义的日语观必然对其本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知产生积极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与影响。也就是说,针对这一课题的考察是汉日词汇交流史研究的基础和关键。

通过考察发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人从最初的对日语的一无所知,甚至是无视轻视,到积极主张学习日语,并身体力行地通过引用大量的“日语借词”来表达新事物、新思想、新理念,进而丰富和完善了近代汉语词汇,这一变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曲折的过程。而正是基于当时这种积极的日语观,特别是对日本假名文字的高度评价,才促进了近代中国言文一致(白话文)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发起的文字改革的萌芽,为大量的日语借词融入到近代汉语词汇中奠定了坚实而良好的理论和社会基础。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就清朝末期的社会环境而言,这种变化是相当突然和剧烈的。这种冲击也必然招致了清末一些“遗老遗少”等保守人士的激烈反弹。一些守旧的知识分子对出现在中国社会的新名词抱有强烈的质疑和批评态度,这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欢迎派”或者说是“推进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情况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对日语认知的多样性、复杂性。

第二、对部分辞书、文献在词源认定方面的作用及其价值进行了初步探索。

长期以来,采用怎样的标准来认定词汇的起源,特别是,以哪些文献(资料)作为词汇语源认定的第一手材料,一直是词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难题。本书选用了部分具有较高权威性和代表性的英华·华

英字（词）典、日文对照考察资料、中文对照考察资料，在初步探索了认定汉字词汇语源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对早期的辞书进行整理和分类，分析了部分辞书在编撰方面存在的系统性和延续性，并尝试着具体探讨了其在汉日词汇交流研究领域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

实践证明，在对词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科学考察时，通过调查和分析当时使用的辞书的方法来弄清新词意义和用法是最准确而最普遍的考察方法。特别是，对近代英华·华英字（词）典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本书还对清末出现的“奇字解”类文献、《明六杂志》、《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法规解字》、《英华和译字典》等文献（资料）收录的“汉语新词（日语借词）”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明确了这些文献资料在中日两国词汇交流史研究领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第三、以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鲁迅、周作人等人在其作品中使用的日语借词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对汉日词汇间的发生、发展、借用关系，以及最终得到认定的过程进行了考察。

此部分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就结论而言，以梁启超、鲁迅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确实在中日两国词汇交流、特别是日语借词融入到现代汉语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另外，考察的结果证实，日本在使用和翻译西方的文献资料时使用汉字创造出大量的新词，例如：“哲学”、“革命”等。这些新词通过在日本学习或生活的中国人的使用被传播到了中国。这些新词的使用不仅对汉语在文章体裁上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还丰富了近代汉语词汇，成为现代汉语外来词的一个主要源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日语借词”。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汉语”占有绝对地位的古代，日本人创造的一些特有（专用）词汇也会伴随着两国密切的文化交流活动传播到中国。同样，到了近代，尽管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角色转换，日本开始占据文化输出的主导地位，大量的“日语借词”开始传播到近代中国，但与此同时，一些由中国人翻译、创造

的新词（例如，“法律”）也被传播到了日本，形成了中日两国间的汉字词汇的互通互融。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堪称是非常独特的现象。

此外，为了更加准确、形象、客观地反映中日两国汉字词汇交流的全貌，本书选定梁启超作为代表，把《饮冰室合集》（文集45卷、专集104卷）作为主要考察资料，从宏观的角度对梁启超使用的“汉语新词（日语借词）”进行了“语志学”考察，初步理清了这些“日语借词”的来源（发生时期）、传播的时期及方式、以及最终是否得以融入到汉语词汇中的基本情况。

考察结果表明，从日语借词的来源来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日本独自创造的汉字词（所谓的“和制汉语”，例如，“哲学、催眠术、常识、伦理学、社会主义”等）；二是日本人借用古汉语词汇并赋予了新的含义而创造出来的“新词”（例如，“革命、经济、社会、教育、国家、改革”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律、木乃伊”为例，这些词大概是在明治时期由西方传教士或是由中国的洋学人士在传教和翻译西方文献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新汉字词”。不过，这些词很可能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相反，这些词被日本人借用后却由于得到了普及而根植到了日本社会。之后，借助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著名历史人物的使用而被人们所重新得认识。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汉日词汇交流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表明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从词汇的传播途径和结果来看，在本书所列的考察对象——日语借词中，大部分都融入到了现代汉语中，一部分则在近代中国得到暂时利用后被其他词汇所替代（例如，“单本位、国立银行、株式会社、小切手、手形”等），极少的一部分则只仅限于传播者自身的使用而未能得到广泛的普及（例如，“小作、社债、为替手形”等）。

第四、本书并没有单纯地局限于针对汉字词起源和发展的探讨和研究，更试图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探讨汉日词汇交流及其相关的诸多问题，在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全貌的同时，初步摸清了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

本书是在由作者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日两国词汇交流史”(结项证书编号:20141394)结项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筛选、修改、完善而成的。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修刚教授、徐一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朱京伟教授、曹大峰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谭晶华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栋梁教授、王健宜教授,对外经贸大学的李爱文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具体研究工作的李丹蕊、王耀振、刘泽军、蒋芳婧、贾丽等老师和宋玮同学为项目的顺利结项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陈娟、邵艳红、陈静静、常晓宏、李鹏等几位年轻教师分别与笔者合作完成了第三编中的第一章清末“奇字解”资料对日语词汇的记述与使用,第二章《明六杂志》与近代中日汉字词汇的交流,第八章康有为在中日两国近代词汇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第十一章鲁迅在中日两国近代词汇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第十二章第三节周作人作品中的日语汉字词、第四节周作人对近代汉语词汇形成与发展的影响等章节的撰写工作,使本书的结构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考察更加全面。

细想起来,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笔者就读于日本国立大学——北海道大学博士研究生阶段。作为前期成果,本人还曾先后主持完成了2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梁启超在日语借词融入到汉语词汇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中国人的日语观”,以及天津市教委科研规划项目“近代汉语词汇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影响”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在学期间,还是毕业回国执教后,一直得到了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石塚晴通、池田证寿教授,北海道教育大学吉见孝夫教授、夏井春喜教授,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成城大学陈力卫教授,韩国高丽大学李汉燮教授、早稻田大学宫崎里司教授、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高田智和教授等授业恩师和本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的指导和帮助。

课题完成期间,笔者曾数次赴日收集考察资料。访问期间,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日本语教育学会、北海道大学、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库、日本国立图书馆、关西大学、城

西国际大学、北陆大学等学术团体和高校热情周到的接待，城西国际大学的水田宗子教授、袁福之教授，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荒川支部的渡边清社长、渡边定子老师更是在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给予了热情关照和巨大帮助。

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综合语种出版分社编委会薛豹主任、日语部杜红坡主任、戚新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的庞中磊、王晓敏、孙琦等老师、以及硕士研究生潘海薇、周春丽、王翰深、温如春积极参与了审校等工作。

在此，谨再次对在课题完成过程中给予本人指导、帮助、支持的各位领导、老师、同事、同仁、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和条件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着许多需要商榷，甚至是不当之处，还请各位读者、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李运博

2018年元月

凡 例

- 一、汉语或日语引文中出现的汉字的繁体字、旧体字和异体字等，无特殊需要，均改为汉语、日语的现行字体。
- 二、引文中出现的黑体字或词语的下划线，均为笔者所标注。
- 三、文中凡未注明日语引文翻译出处的，均为笔者所译。
- 四、文中除原文引用之外，年代一律按照公历时间标注。
- 五、目前，在中日两国词汇交流研究领域，关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汉语词汇的名称尚未得到统一。在日本，有“和製漢語”、“近代語”、“訳語”、“新漢語”、“明治のことば”等提法；在中国，有“汉语新词”、“日语来源的外来词”、“日源词”、“和制汉语”等提法。本研究虽未能对所有汉字词的语源进行逐一考证，但是为了保证考察的客观性和一致性，除根据考察实际使用“新汉字词”的名称外，统一使用“日语借词”这一名称。
- 六、在正文部分，如无考察上的特殊要求，原则上对于日文辞书、资料均翻译成中文进行标识。但若其中夹杂着假名或日文特有汉字时，则使用日语原文标识。例如，《哲学字彙》、《明治のことば辞典》等；在参考文献部分，本研究将所用文献分成中文和日文两大类。考虑到查阅上的方便及书写习惯，表记一律使用原文。
- 七、为了保证文字表述的简洁性，特别是在制作相关表格时，对部分作为对照考察资料的辞书使用了简称，例如，《汉语大辞典》简称为“《汉语大》”、《日本国语大辞典》简称为“《日国大》”、《大汉和辞典》简称为“《大汉和》”等。
- 八、关于注解，全部采用脚注的形式。考虑到部分篇幅较长，表格、注释等过多，因此按照以下原则对表格、图形、注释进行排序：第一编、第二编、第四编采用整篇排序，第三编则采用每章排序。

目录

第一编 序章	1
第一章 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2
第二章 相关的研究成果与课题	6
第一节 中国学者的研究	7
第二节 域外学者的研究	21
第三章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29
第四章 对主要研究资料的考察与应用	33
第一节 主要的日文文献（资料）	34
第二节 英华·华英字（词）典等文献（资料）	42
第三节 相关的中文辅助对照资料	45
第四节 基于辞书类文献（资料）的相关考察	46

第二编 对日本语言文字的记述与认知研究编… 49

第一章 关于日本（日语）研究的起点	50
第二章 明朝之前的古文献关于日本语言文字的记述	52
第三章 明朝的古文献关于日本语言文字的记述	56
第四章 清代早期文献关于日本语言文字的记述	59
第五章 近代中国人对日本语言文字的认知与受容 ...	63
第一节 张之洞对留学日本及翻译日文文献活动的倡导与推动	64
第二节 王照对日语语言文字的认知与应用	72
第三节 戴季陶对日语的认知及评价	82
第四节 对“日语借词”使用的否定与批判	85
第五节 结语	91
第六章 现（当）代中国人对日本语言文字的认知 ...	93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对日语的认知	93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对日语的认知	97

第三编 对日语借词的认知、使用、传播研究编…

..... 111

第一章 清末“奇字解”资料对日语词汇的记述与使用	112
第一节 早期的“奇字解”资料	113
第二节 关于《日语古微》	122
第三节 关于《新名词训纂》	130

第四节 结语	135
附录一	136
附录二	137
第二章 《明六杂志》与近代中日汉字词汇的交流	140
第一节 关于《明六杂志》	141
第二节 《明六杂志》的撰稿人及其特点	144
第三节 从《明六杂志》看汉语对日语的影响	149
第四节 从《明六杂志》看日语对汉语的影响	158
第五节 结语	172
附录一	173
附录二	178
附录三	179
第三章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在中日汉字词汇交流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181
第一节 关于《新译日本法规大全》	182
第二节 关于《法规解字》	184
第三节 《法规解字》中“新汉字词”的出处与类别	186
第四节 辞书类文献对《法规解字》中三字词词条的收录状况	189
第五节 结语	194
第四章 《英华和译字典》中出现的“新汉字词”	195
第一节 罗存德《英华字典》与《英华和译字典》	196
第二节 日译“新汉字词”在《英华和译字典》中的出现形式	199

第三节 《英华和译字典》收录的“日译新词”	206
第四节 结语	207
附录	207
第五章 “汉制新词”对近代日本汉字词汇形成的作用与影响	210
第一节 关于“木乃伊”词源的调查	211
第二节 关于“法律”词源的调查	214
第三节 结语	217
第六章 傅云龙与中日两国的汉字词汇交流	219
第一节 《游历日本图经》与《游历图经余记》	220
第二节 傅云龙对日语的记述与认知	222
第三节 傅云龙作品中出现的日语借词	230
第七章 黄遵宪在中日两国近代词汇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	233
第一节 《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234
第二节 黄遵宪对日语的认知	239
第三节 黄遵宪作品中出现的日语借词	250
第八章 康有为在中日两国近代词汇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	253
第一节 康有为对翻译日文图书的倡导与推动	255
第二节 关于《日本书目志》	259
第三节 《日本书目志》中出现的日语借词	262

第四节	关于《日本变政考》	264
第五节	《日本变政考》中出现的日语借词	265
第六节	近代中国对《日本变政考》中的日语借词的受容	271
第九章 梁启超在中日两国近代词汇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		274
第一节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275
第二节	《汉语大词典》对梁启超书证的收录情况	284
第三节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汉字词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295
第四节	政治避难前的梁启超与日语的接触	297
第五节	在日避难期间梁启超与日语的接触及创作活动 ...	301
第六节	在日避难期间梁启超对日语的认知	306
第七节	梁启超作品中出现的汉字新词	314
第八节	结语	321
第十章 对梁启超所用新词（日语借词）形成和发展过程的 考察		322
第一节	关于《饮冰室合集》	322
第二节	研究的方法、步骤及对象	325
第三节	对标注有“日本谓”“日本人谓”等标识词汇的考察	327
第四节	对未标注有“日本谓”“日本人谓”等标识词汇的考 察	339
第五节	结语	362